

远引旁搜观黄白，半生痴绝梦徽州

王振忠

自1996年起，我先后出版过《斜晖脉脉水悠悠》《日出而作》和《山里山外》三部随笔文集。其中的第二部，主要文章源自1998年以后在《读书》月刊上开设的“日出而作”专栏，再加上同时期发表于《万象》《寻根》等杂志上的学术随笔。

此次结集的小书，取名为“从黄山白岳到东南海域”。诚如副标题“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所示，其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明清时代江南社会的文化现象，二是对域外世界的状摹与追寻。

徽州地处黄山白岳之间，“黄山白岳”也就代指皖南的徽州，这是我最近三十多年长期关注的区域之一。在书中，我首先勾勒出晚明人文地理书写的复兴轨迹，并聚焦于皖浙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追寻历史劫难之流传，发掘年湮代远的相关记忆，聆听黄山钟鸣的世纪回响，关注波流披靡之中的苦乐异景，剖析“徽州朝奉”在江南诸多传奇之递嬗演化，感叹晚近庚子洪灾中的风雨沧桑……

整整30年前，谭其骧先生就在《复旦学报》上撰文，呼吁应加强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人“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不过，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对此，谭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章潢的《图书编》、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王士性的《广志绎》，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在他的倡议下，上述诸书都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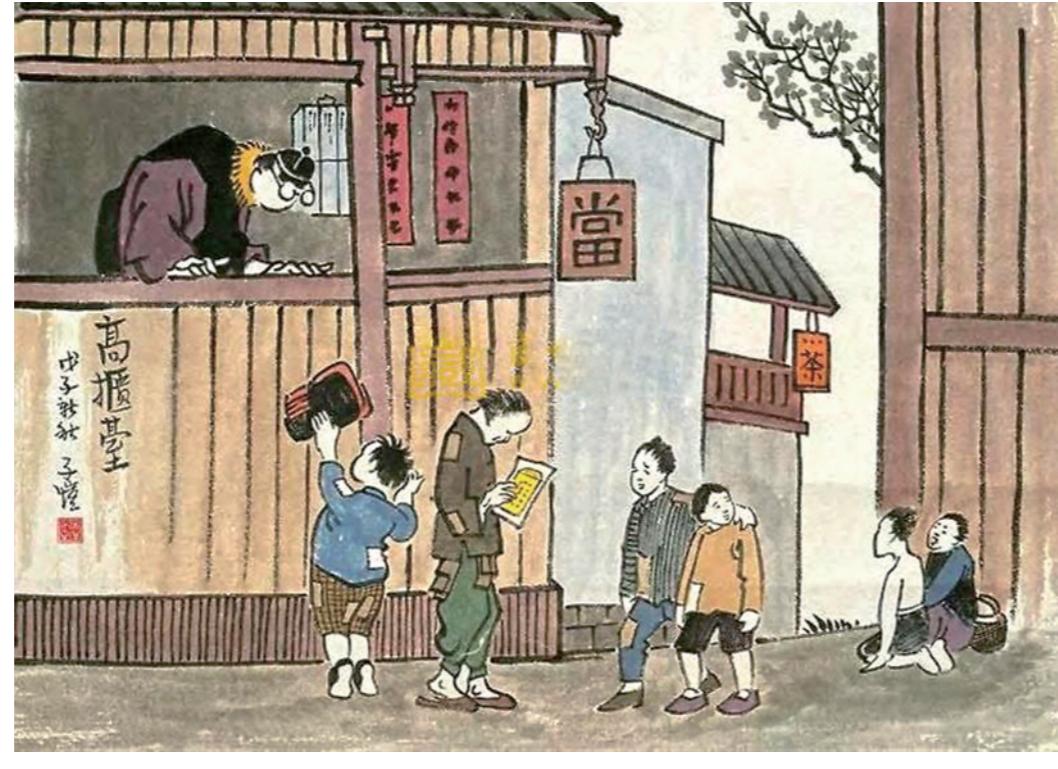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为系统、最具价值的是《商贾纪》。在我看来，《商贾纪》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措辞皆是在刻意模仿《史记·货殖列传》。事实上，在明代，《货殖列传》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一些徽商甚至是将《货殖列传》当成必读的教科书，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从商经验。在写法上，《史记·货殖列传》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各区域的经济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区域间差异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因素。而《商贾纪》也注重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和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与观察，将经济与文化、风俗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另外，张瀚（1510年—1593年的《松窗梦语》作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王士性（1546年—1598年的《广志绎》自序于万历丁酉，即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而谢肇淛（1567年—1624年的《五杂组》则出版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无论是作者之生活时代还是著作的成书年代，皆以张瀚的《松窗梦语》为时最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贾纪》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标志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相关传统在明代的全面复兴。

二

在明清经济史和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徽商及徽州风俗历来是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问题。张瀚在《商贾纪》就指出：“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镳，织陆鱗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儇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撰筝琴，长袂丽屣，争妍而取容……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休宁和歙县是徽州府最为重要的两个县，也是商业发展最早两个县。万历《歙志》的编纂者谢陛，就曾仔细研读过《史记·货殖列传》，他将歙县的现实与之相对照，在方志中单列《货殖传》一篇，详细分析了两者的不同。其中的不少资料，后为顾炎武和黄宾虹等人所沿用。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行当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族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胡人”及回族商人，显然亦顺理成章。

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断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植于茅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



丰子恺漫画《高柜台》。王振忠供图

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此处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为不少人所臾不可或缺。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进而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传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三

在明代，歙、休因其富名在外，故二县的赋役负担即使在徽州也是首屈一指。

在传统时代，吏役是行政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角色。举凡赋税催征、拘拿疑犯，皆需吏役。正因为吏役的重要，在许多场合，吏役窟穴其间，上下其手。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特别是这些吏役下乡，往往剥肤吸髓，破人身躯，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反映的就是无比残酷的事实。

有鉴于此，在明清时代，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殚思竭虑地采取各种措施，力图限制吏役的职权。在清代，县级行政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征收钱粮中的自封投柜，以及滚单、纸皂之例。所谓自封投柜，是指清初为了严防不法官员滥用职权，随意多征或重复收税而采取的措施。此后，各州县经征各项钱粮，均设立一银柜，加钤司、府印信，民户交纳之银钱，皆自行投入柜中，吏役人等皆不得假手其间。此外，纸皂、木皂催科亦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徽州文书中，目前发现有不只一件的“纸皂”：

这张印刷品右上长框中写着“纸皂代差”，左下部画着一个头戴暖帽的清代差役，左手举着“专催欠户”之牌，右手则提着一长串绳索或镣铐，其上有“不用酒饭，专催玩户，如再抗延，签拿究比”的字样。如此形象，意思是对于当事的欠户先礼后兵。“不用酒饭”，当然是相较于真实差役下乡而言。右边纸皂上的正文，则密密麻麻地写着官府的催缴通知。此“纸皂代差”文书，上面写有真实的姓名，并钤有官印，应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实物。

清代官府执法中的“纸皂代差”，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它希望小事由乡族调处，大者才用“纸皂代差”，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扰民，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一种警告。从其初衷来看，这是一种便民措施，也通常被视为官一方的德政。不过，一方面，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涉嫌违法者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循规蹈矩的“良民”固然不少，但钻山打洞之“刁民”想来亦不乏其人。因此，无论是“纸皂代差”还是“木皂代差”，实际效果仍然不理想。而在另一方面，差役总在想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根据理想设计，以纸皂自拘，两造至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直，而不假手于吏役。不过，原告与被告常常视如水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势必会引发争执。在这种背景下，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役，撕衣毁票，将事情闹大，以激怒官府，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创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看来，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看似完美，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却颇为复杂。

四

频繁的商业活动与社会流动，使得徽州形成了大批契约文书。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这些原始资料多

达5万件以上，目前除了国内之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抗战结束后，著名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而在1956—1958年间，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徽州文书在皖南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100万件（册）。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敦煌学”和“徽学”相互接续，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成了徽州亮丽的名片，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一文中，笔者指出：对于徽州文书的认识，目前在历史学界，仍有一些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在他们的印象中，徽州文书不过只是一些土地契约，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通过市场买卖辗转而来，缺乏系统性的脉络，从而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实，此一臆断，完全是不了解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他们的错误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事实上，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虽然说在最近数十年，各地的民间文书层出不穷，但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质量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就像黄忠鑫在歙县廿五都飞地找到的那批文献一样，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有相当多皆有着很好的系统性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其它区域不同，丰富的传世文献，使得徽州有着极好的“史料环境”，任何一种文书的新发现，往往很快就能在整体史料环境中寻找到相应的坐标，从而发挥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此，与其凭臆见，对现有的文书史料多所责难，还不如面对客观现实，清楚地了解作为历史学者的擅长与局限。在我看来，通过实地考察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于传疑传信之间发现富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真正读懂手头的民间历史文献，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五

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山限水隔”，地理上颇为闭塞。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之转输，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高墙深屋虽然幽暗，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四水归堂”中精心呵护的盆栽，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明清时代，无数徽人志欲经商，远谋财富，他们自新安江东下，风帆快利，几经辗转进入长江三角洲。从那里开始，逐渐汇入浩瀚的东海，驰骋于东亚世界。而30多年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以“徽学”为起点，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迄今所见，反映长崎贸易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徽商汪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作于长崎唐馆的《袖海编》，不仅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翁广平《吾妻镜补》所频繁征引，而且还先后被收入《昭代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至19世纪中叶，该书又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为此，茨韦特科夫著有俄文译本《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此外，1941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亦将《袖海编》一书翻译成日文，并附有日文简介及注释，在东京出版。这些不同的文本，若影与月俱、香随风送，于长天远水之间遥遥相映，成了海内外了解18世纪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经典之作。

16世纪以还，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从其父亲一辈开始，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方法。元文四年（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经过官方的特许，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锁国之窗”——长崎，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对中国墨详加探究。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宽保二年（公元1742年，清乾隆七年），松井元泰刊行了《古梅园墨谱》，此一墨谱，显然是模仿明代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等，其中，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透过《古梅园墨谱》等域外文献，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7年，作为复旦大学派遣的校际交流学者，我首度赴日本访问。其间，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抄件，收入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幕府官员官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官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此书是官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作“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政策，长崎是唯一“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是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携带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从《唐土门簿》中填写的人名、地名和店名来看，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药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由此可见，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以经营布匹、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这些，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

1997年，我刚到日本不久，所在大学就组织前往冲绳观光，那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昔日琉球国的风俗民情，以及与福建沿海的密切关系，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的将近一年间，除了冲绳之外，我还曾孤身一人前往山水佳胜的长崎旅行，独自漫步于长崎的街衢巷陌。其时，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却时时生发出似曾相识之感。与冲绳类似，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之窗”，长崎在不少方面也与中国交往频仍，尤其是与福建沿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海水连琼浦，遥瞻日出乡”，本书中的《长天远水琼浦月》等文，皆立足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本位，从远处眺望历史上中日之间的频繁交往。

例如，关于江户时代长崎唐馆内中国人的生活，最为生动的汉文描述首推《琼浦佳话》《译家必备》等唐通事教科书，而颇为直观的图像则莫过于各类唐馆图。目前，关于长崎唐馆图已出版有两种资料集：一是2003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二是2005年出版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

中古时代，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递交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这是7世纪初日本面对西邻强国刻意表现出的自尊姿态。而今，借助江户时代的这些唐馆图，则让我们遥望历史，而有了许多清晰的发现。

近世东亚形势波云诡谲，倘若结合中日相关史料，可以看到——福州的土神信仰，随着东渡的僧侣和海商水手，被放在了东亚贸易、东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去演绎……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从事东西洋贸易的福州人，与早年的长崎诹访神社之信仰有着不解之缘。此一例，集中凸显了东亚海域的跨国贸易、移民网络、民间信仰、文明冲突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亦隐含着民间文化交流中极为丰富的诸多内涵。

近数十年来，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此后，文化史，特别是“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之发展，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而区域社会史的方法，亦为域外汉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域外文献的大批刊布，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望转向社会史的研究。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使得相关研究得以更为深入。在此背景下，各类图像、域外汉文文集、笔记，以及语言课本等，遂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翻阅这些资料，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令人时常有邂逅佳景、襟襟忘俗之感——长崎唐馆图、唐通事相关史料以及长崎浮世绘等，为中国区域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平添了诸多线索，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繁华废兴若山情水态，遥望千山竞秀，静听百鸟争鸣，吾辈远引旁搜，质疑求是，既需近观细思，又要遥瞻远眺。既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瞻顾中外，还应当溯流寻源，聚焦于水云深处的黄山白岳，较近距离地细致考察江南的那一域旷野沃壤。

何宇宏

几年前，因为一部书的出版，有幸结识了复旦出版社的王联合先生。

之后很少联系。对王先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朋友圈。

王先生喜欢发圈。那些隔三岔五出现的追忆家乡、父母、童年的文字，就如那粼粼波光，虽琐碎零落，却格外耀眼，毫不掩饰地传递着这个桐城人对故乡的眷恋。

因此，看到网上预售签名版《言他：桐城往事》，我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单。

期待中也有隐忧。虽然早已了解王先生的才华和语言功底，但毕竟是财经专业出身，而小说创作的难度又太大，何况还要融入“桐城文化”这一背景。他该如何处理写实与虚构的关系？如何处理桐城文化与那片土地上人与事的关系？如何从大家耳熟能详的“桐城派”视角中抽离而写出新意？

事实证明我纯属杞人忧天——阅读的过程带给我太多惊喜！

小说巧妙地淡化了人所共知的“桐城派文学”及当地众多历史贤达。而浓墨重彩的，却是桐城一个名为汤乔的小村庄及周边村镇的乡野风俗。显然，在这部小说中，文化不只是塑造人物的背景，也是独立于人物故事之外的另一个主角。

这本书是读不快的，因为一个字都不想放过。书中故事框架之外一切有关时代变迁与风俗传说的琐碎叙述，都那么亲切有趣。我不是桐城人，但我想了解那片神秘的土地；我不是桐城人，但书中所写的那些风俗画、那些人事物浮沉似乎也是我的过去，是我们并不遥远，却在被遗忘的危途中。

为女人赋名的努力也弥漫于小说的各个角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被桐城历史上显达的男性群贤淹没的女性的光辉与力量。

对于女性，作者是不吝赞誉的。比如明代著名学者、桐城学术的领头人方维仪，作者不仅介绍了她作为著名诗人、画家、通经史、著述丰硕的超卓成就，更强调了她对儿孙以智的用心教养，“方以智能够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提并论的大学问家，凝聚了方维仪的无数心血”。对于桐城才媛，作者盛赞她们的诗歌“清丽风雅、温柔敦厚、柔婉凄美、沉郁顿挫，用心灵之笔创造了全新的诗歌世界”。

小说中的普通女性，同样享受了超越男性的特殊观照。故事虽然以刘义雄回乡办厂为主线，但是，活跃在故事前景的，却是女性。刘义雄似乎是那一根串起珍珠的麻线，而女性则如颗颗珍珠，熠熠闪光，姿彩各异。然而，她们似乎又都离不开那根麻线，稍一抖动，便被拽入了命运漩涡。

她们的聪明、勤劳与坚韧并不逊于男人，却都由男人决定着命运。无论是顺应或者逃离，她们都未曾挣脱这股“强大傲慢的专治